

犹向书林努力来^①： 基于张元济书信网的公共交往研究

隗静秋，严佳馨，王琦然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书信是近代知识分子交往的重要媒介。通过对近代名家书信研究可了解其社会交往关系，把握事实细节，进而可以揭示部分历史真相。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张元济书札》及《张元济全集》为数据来源，构建张元济个人书信网络，分析其信联特征，挖掘书信通信背后的潜在人物关系，并加以史料佐证，试图客观清晰地还原张元济公共关系构成的真实情况，从而进一步开展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人脉关系的综合探索。研究发现，张元济与知识分子、馆内同仁等学缘、业缘群体交流颇多。同时，信联网络中知识分子社群聚类明显，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开放性、复杂性。此外，网络节点异质性强，社会资本丰富。反映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在公共事件中广泛寻求社会支持、推动社会发展的路径。研究以史为鉴，以期当代出版人、编辑带来启示，也为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向作出尝试。

关键词：张元济；近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书信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3) 03-0068-13

文化权力网络理论认为，中国人社会身份的获得与社会交往的开展往往以家庭、职业、政治、经济等因素作为基础单位进行关系网络的建构。^[1]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支撑这一群体形成组织的枢纽则逐渐以报馆、出版社、大学等文化机构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开展公共交往提供了实体空间。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文化历程中并称为“双子星”^[2]，而商务印书馆在推动近代文化产业尤其是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自1902年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政期间也常被史学研究者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时代”^[3]，其地位贡献不言而喻。在当时出版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张元济谋求商务印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积极调动个人社会资源，与政、商、文等社会各界人士皆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张元济年谱长编》所附“人名索引”中可以看到，与张元济产生过交往关系的相关人物多达700余人。^[4]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曾是士大夫出身，转型为知识分子，再成为先进商绅的改良主义者。其身份的复杂，也佐证了他对近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亲历。因此，对张元济公共交往展开研究，不但可以揭示张元济公共关系构成的真实情况，更是对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人脉关系的深入探索。

张元济的个人交往充分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褪去“士”的政治外壳后，其人脉关系网络与社会活动开展典型特征。张元济开展社会交往的广泛性与知识分子对文字的普遍运用使得大量张元济的个人书信得以保存，这也为探察其公共交往提供了可考的依据。同时，书信中寄件人、收信人、地点、时间等数据十分清晰，对后续张元济社交网络构建及计算提供客观准确的支撑，其交往规模与特征展

① 犹向书林努力来：原句为“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晚年所写《告别诗十首·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中的一句，表达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矢志初心。标题将“故”改为“犹”有勉励之意，望当代出版人能够以张菊老为榜样，继往开来，立足出版，传播智慧，共筑灵魂工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21ZD322）。

作者简介：隗静秋，男，副教授，博士；严佳馨，女，硕士研究生；王琦然，女，硕士研究生。

现也更为清晰可感。本研究基于公共交往的研究视角, 从张元济的个人信札入手, 通过构建书信网络挖掘其公共交往的特质, 进一步分析近代知识分子如何依托出版社这一公共空间, 进行社会网络的人际实践与资源整合, 并如何推动社会转型与发展。

在研究设计方面, 为避免局限于个体单节点分析视角, 在“收信人—寄信人”网络的基础上, 构建“共同寄件人”与“联合寄件人”子图, 进一步挖掘个人书信网络潜在的群体关系, 并结合史实加以佐证, 客观还原张元济的公共交往特征, 进一步提炼总结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交机理与文化产业转型的时代内涵, 以期为张元济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以数据计量与书信史料佐证相结合, 客观呈现社会交往背后的时代特征及人文理论动机, 希冀为出版史学相关研究的数字化转向作出有益尝试。

一、相关研究回顾

(一) 近代出版人公共交往研究

对公共性交往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公民交往方面的论述。由于古希腊城邦特征公共交往多发生在公民大会、陪审制度、宗教节日、戏剧节和运动会等场景中, 他便将政治性交往与家庭交往进行区分。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承其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公民交往的描画。与之不同的是, 由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方面的研究, 其对于这一交往的探索开始出现了公共交往的雏形。在其观念中, 公共性的交往并非简单定义为家庭之外的交往, 反而是率先发生在家庭空间中, 随后与私人交往产生疏离的公共领域交往。^[5] 因此, 本研究对公共性交往的探讨沿袭这一思路, 既关注公共场域中的社会交往行为, 也兼顾以家庭为代表的亲缘关系中的交往活动。故本次研究将公共交往视为作为主体的人在国家和家庭 (族) 之间的社会场域所进行的交往活动, 活动以事务与行动的集体性为主要特征。^[6] 许纪霖提出以公共交往视角研究“知识人社会”是一项全新尝试,^[7] 并强调都市型的公共空间会产生新的文化权力模式。^[8] 关于近代出版人公共交往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面向: 一是将出版人的交往结构作为关注点, 在传统士大夫的交往中, 血缘、地缘是人际脉络建立的主要结构, 而近代知识分子在职业性文化机构工作, 职业化的业务往来客观导致了出版人亲缘、地缘交往的式微^[9], 对学缘、业缘交往的崇尚^[10], 而近代知识分子新的人际网络形成方式与动因成为此类研究的重点。另一种研究面向则聚焦于出版人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 强调公共交往与活动空间的内在联系。该类研究分为三种支流: 一是围绕以书局、报馆为实体空间的公共交往^[11]; 二是以出版人社团、书业同业组织为纽带的公共交往^[12]; 三是以出版期刊为媒介, 知识分子在平等、开放、理性的文化空间中间接展开公共交往, 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13]。

(二) 张元济个人社会交往研究

张元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士大夫阶层, 随着近代先进西方思想的引入, 张元济转型为新型知识分子, 加之主政商务印书馆商绅也成为他的一个身份标签, 多元的身份特征使其成为研究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典型样本。同时, 张元济自190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 为其工作半个世纪之久。即使在近代社会转型动荡时代, 也维护商务印书馆长期处于稳定的发展环境中, 使商务印书馆一度成为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14] 张元济广泛的社会公共交往是推动商务印书馆不断发展的一重要原因。国内学界对于张元济个人社会交往的研究成果颇丰, 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类研究是梳理阐述张元济与具体对象的交往脉络^[15], 研究者重点关注张元济、王云五两位出版家的往来, 对他们在全面抗战期间的通力合作进行了详细梳理, 通过二人的出版交往展现了时代背景下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 学者闫卫平也对张元济与王云五的交往展开研究, 不同的是, 研究以《张元济年谱长编》为基础, 通过史料佐证了1937年至1949年间两人的交往历史。^[16] 而在另一类研究中, 学者则是将张元济的社会交往看作一个整

体,对其交往方式及对象进行群体性梳理。在《张元济与近代文化》一文中,学者对张元济的人生脉络铺叙,于时代变迁和个人轨迹的重合之处探索隐含的社会交往关系。^[17]而在《官商身份转换背景下的张元济报刊媒介认知与实践》一文中,由于身份的转换而造成的人际交往转变,则成为学者研究张元济主要的侧重点^[18],同时出版生活史研究视阈也是对出版人公共交往探讨的新视角^[19]。如对其日常生活、休闲娱乐中的行为的回忆与评价^[20],甚至通过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来洞察文化机构的管理与发展^[21]。生活史撇开政治话语与宏大叙事的论述,着眼于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见微知著,令人耳目一新。

(三) 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在公共交往中的应用

英国学者李察夫·布朗(Redcliffe Brown)最早提出社会网络的概念,而后,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伯科威茨(Berkwitz S. D.)等人进一步进行定义,认为社会网络是个体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构成的系统,而该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22]放置中国语境,早期由于传统农耕社会形成的“差序格局”^[23]的沿袭,研究环境中社会关系网络分析较少出现以个体为单位展开的社交关系分析,而大部分是对特定群体进行探索^[24],分析其普遍存在的社会交往问题。随着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兴起,通过借用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性人物的交际网络,也成为一种研究趋势。以往个体作为研究视角的缺憾也得到补足,学者周潋通过将范长江个人的社交进行结构化呈现,还原人物行为轨迹及其时代贡献。^[25]但具体到出版语境,无论是对出版机构抑或是典型人物,应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目前仅见于对现代出版业的企业经营探讨。^[26]以张元济为核心的相关研究则仅仅止步于对相关文献中涉及关键人物提名分析,并未真正实现较为宏观的量化呈现。在《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企业——简论张元济时代“文化商务”品牌及历史意义》中,研究者提到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与张元济的交往,表明他们作为关键节点为商务带来的人际网络,但对于节点的划分与证明却缺乏进一步的数据支撑。^[27]

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以张元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研究中,或是历史资料维善、纠偏与补足,或是对张元济个人思想、行为的评价分析,而对其公共交往研究也多以收集、梳理的方式铺陈,缺少结构化的数据呈现方式。因此,一方面,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张元济个人信件进行实证分析,再现其个人社交网络。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分析在具体研究中也存在着以中、宏观视野为主的倾向,微观视野下的个人分析也多以中心人物为主,缺乏对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关照。本研究试图从个人信件网络的节点中发现社群,并进一步探索隐藏人物关系,挖掘张元济交往的社会意涵。

二、张元济公共交往网络建构

(一) 数据来源与清洗原则

对于古代书信的数字化处理主要分为元数据和书信正文两部分。其中,元数据是指收信人姓名、寄信人姓名、写信日期、写信、寄信地址5个元素。^[28]本研究数据来源于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书札》(上中下册)及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全集》(书信1—3册)。知识分子间的交流信息一部分可反映在其书信往返中,寄收人、寄发数量、谈及内容可从侧面反映出其公共人际交往情况。因此,本次研究通过现有信件文本进行内容筛选,考订查阅署息不详信件,以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本次研究共选3880封书信,涉及186位通信者,由于书信不同于一般记录性文字,其存在明晰的寄收者、时间、地点等信息。研究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总结出书信元数据中对词语搭配结构背后所隐含的单向或双向的通信关系:

(1) 致某某人函/书:如:《致某某书》表写书信给某某人。

(2) 报/复/答某某人: 如:《报任安书》/勿此先复, 余后再稟/未尝苟且, 或答人简札。表回复某某人的书信。如若遇到缺少该信件前一封寄件数据情况, 根据收件人和寄件人署名在后续网络建构中补全相关节点。

(二) 张元济个人书信网络构建方法

本次研究旨在通过个人书信梳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公共交往情况。书信数据中所含节点较为复杂, 除与张元济这一节点构建直接连接关系外, 还存在着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不同关系中同时存在不同的信件流向, 面对这一数据情况, 通常使用超图作为网络构建方式。超图的应用对于处理结构复杂, 连接形式多样的复杂网络提供了更多研究视角选择, 但同时也使得研究指向与优化变得更加复杂。^[29] 而用特定子图来分析特定关系, 则更有针对性、准确性, 通信往来关系是信联网络中最为重要研究内容。因此, 本研究援引李惠等学者搭建的“古代书信体文献的社交网络模型”^[30], 其将通信超图划分为“寄信人—收信人”网络、联合寄信人和共同收信人网络, 以此来对应信联网络中的三类人物关系。

上述提及, 书信的元数据一般包括5个元素, 即 $l = (S, R, D, l_s, l_r, C)$ 。其中 R 表示收件人集合, S 表示寄件人集合, L 指代地点集合 (l_s 为寄信地点, l_r 为收信地点), D 表示收信日期, C 指代对应信件内容。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 该网络数据为加权有向图。网络模型为 $G_{sr} = (V_{sr}, E_{sr})$, 节点集合 $V_{sr} \in V$ 代表通信人, 而有向边集合 $E_{sr} \in V_{sr} \times V_{sr}$ 代表节点间的通信往来。网络模型中相同节点(人物)存在多次信件往来, 在网络中利用权重表示。

共同收信人网络: 该网络为无向带权图。模型建构为 $G = (V_r, E_r)$, $V_r \in V$, $E_r \in V_r \times V_r$ 。如果两人收到同一封信, 二者在共同收信人网络中就构成连接关系。

联合寄信人网络: 该网络为无向带权图。网络建构为 $G = (V_s, E_s)$, $V_s \in V$, $E_s \in V_s \times V_s$ 。至少两人联合署名发出一封信, 二者在联合寄信人网络中就构成连接关系。

上述网络构建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Ucinet 进行计算并用 Gephi 进行可视化处理, 进而从以下两个研究层次依次展开:

(1)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研究: 观察整个网络的连接状况, 包括整体网络密度、距离、中心性, 分析张元济个人书信网络特点, 并对关键节点身份挖掘展开深入分析, 以探究特定历史环境下张元济个人书信往来的现实境况。

(2) 共同收信人网络、联合寄信人网络研究: 依据共同收件、联合寄件行为形成的逻辑, 分析不同网络特质, 通过计算中心性、社群发现、QAP 相关性检验, 挖掘张元济信联网络中潜在人物连接关系, 进一步分析寄件、收件行为节点聚落形成的差异性, 以考察信联网络的连接关系中信息、情感及社会资本的流动与传播。

三、张元济信联网络特征刻画

(一)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分析

由于涉及节点(人物)众多, 为提高“寄信人—收信人网络”效度, 准确测算网络结构特征, 数据筛选原则为每位通信者(或单位)至少与张元济存在5封以上信联关系, 以排除通信的偶然性。经清洗后最终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信联节点共97个, 构建为 97×97 的有向邻接矩阵, 作为“寄信人—收信人”网络构建的数据源。将有效数据置入可视化工具 Gephi, 利用 YiFan Hu 算法, 生成上述数据的关系网络可视化图形(见图1)。点入度排名前5的节点姓名已在图中标出, 以便开展后续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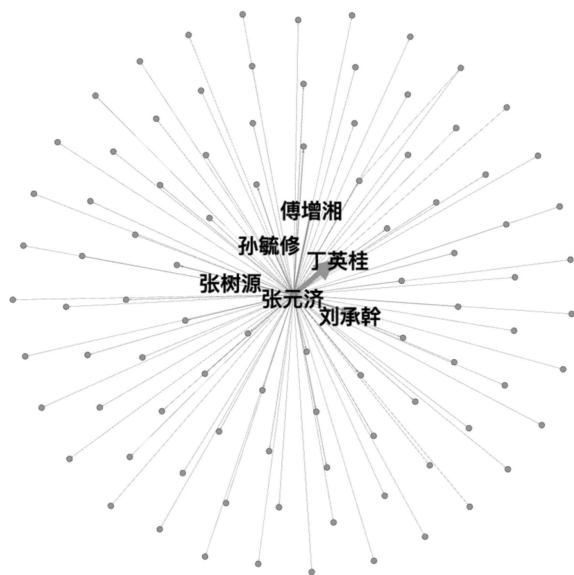


图 1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图

1. 网络结构特征与节点影响力情况

通过 Ucinet 计算,“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存在 97 个节点,106 条边。数据来源为张元济个人信札数据,因此“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呈现出一种以单节点(张元济)为中心的星型结构(Star-Structure),又称集中式网络结构(如图 1 所示)。

执行 Network-Cohesion-Distance 命令,计算出该网络的平均距离(Average distance)值为 1.979。整体网络中,“距离”是指节点之间最短途径/捷径(Path)的长度。^[31]网络平均距离值为 1.979,说明节点之间平均仅需要 2 个节点就能产生连接,成员直接联系紧密。

网络密度(Density)是反映网络中各区域之间关联关系疏密情况的指标。^{[31](11)}网络中关联关系的数量越多,则网络密度越大,该测度的取值范围为 $[0, 1]$ 。执行 Network-Cohesion-Density-DensityOverall 的命令,计算得出整体网密度值为 0.7732,体现网络传播效率高。同时,“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呈现星型包围结构,单中心(张元济)的度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接近 100%,对信联网络其他节点有强大的影响力。^[32]

2. 张元济信联网络活跃节点挖掘

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是衡量中心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指同某一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量。在有向网络里点度中心度又分为入度和出度,入度是指向该节点的其他节点数,出度则用某节点指向其他节点的数量表示。^[33]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信联网络,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独立节点,节点间存在信件发送关系,且为有向关系。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具有接收他人信件行为的节点视为入度,而有寄发信件行为的节点视为出度。寄、收信件次数也是本次研究分析的重点,因此研究使用“权重”代表信联往来次数。加权入度计算指向该节点的边的权重之和,其衡量了一个节点(人物)的人气,加权出度计算指以该节点为起点的边的权重之和,衡量了一个节点(人物)自身的社交喜好。^[30]目前由于书信搜集范围的有限性,主要依据张元济个人书信数据建构网络,因此“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如图 1 所示)是以张元济个人为中心的星型结构网络。即本研究通过对中心度进行分析,发掘张元济个人书信网络人际关系特征。

Ucinet 执行 Network-Centrality-Degree,计算“寄信人—收信人”网络节点的中心度,该网络入度、出度前 10 排名如表 1 所示。

表 1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入度、出度节点排名前 10 节点

序号	节点	入度（In Degree）	节点	出度（Out Degree）
1	丁英桂	943	丁英桂	13
2	傅增湘	286	刘承幹	9
3	刘承幹	250	胡 适	8
4	张树源	157	蔡元培	8
5	孙毓修	152	陈叔通	8
6	顾廷龙	91	罗家伦	7
7	蔡元培	88	叶恭绰	7
8	张家昌	88	汪兆鏞	7
9	胡 适	80	王季烈	7
10	盛宣怀	70	傅增湘	6

为了进一步挖掘张元济书信网络中行动主体的特征，明晰其背后网络心态，研究将点入度与点出度分别取排序前 10 的节点进行数据身份归属统计。按照“知识分子”“馆内人士”“商政人士”“家族成员”进行归类，其中知识分子指未在商务担任职务、承担工作的学界人士，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张元济书信网络中，入度排名前 10 节点（人物）知识分子最多，占到总体的 50%；其次为馆内人士与家族成员均占总体的 20%；其余 10% 为商政人士。从侧面体现出张元济知识分子群体主动寄信交流颇多。同时，出度排名前 10 节点（人物）中知识分子高达 70%，其中并无家庭、宗族成员向张元济来信。同时，张元济信函涉及话题十分丰富，其中有关学术文化、业务交流的讨论仍占据多数，这与张元济在公司业务管理层面推举“新人”，主张“事业不传代”^[34] 的史实相符。总体上，张元济以基于亲缘关系开展与出版相关的社会交往并不多见，他致力于以“弱关系”网络制度破除人情网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关系网络心态的代际流动方式也正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转型在张元济个人身上的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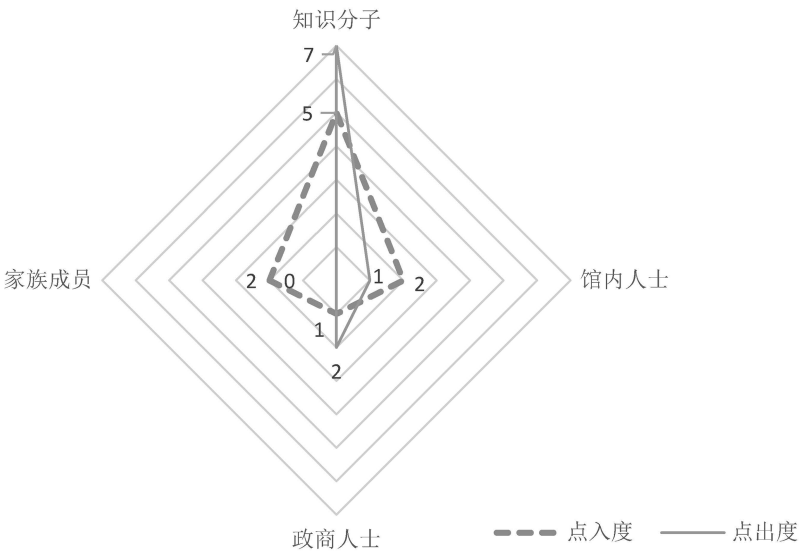


图 2 “寄信人—收信人”网络“点入度”与“点出度”排名前 10 节点身份归属

网络中有关点度中心度的测量仅仅考察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即本地网络），忽视跟该节点有直接联系的节点与整个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连接关系。为了对该网络中的潜在人物关系进一

步开展度量，本研究将在下文突破“本地”网络视角，根据张元济公共交往信联网络中联合寄信人网络和共同收信人网络相关数据，通过社群发现、相关性分析等指标测算展开以下分析。

(二) 共同收件人网络分析

通过数据筛选与清洗，共同收件人网形成 123 * 123 的 1-模邻接矩阵，其中包含 82 条边。通过利用 YiFan Hu 算法生成网络可视化图形，如图 3 所示。图中标出姓名为网络中介中心度排名突出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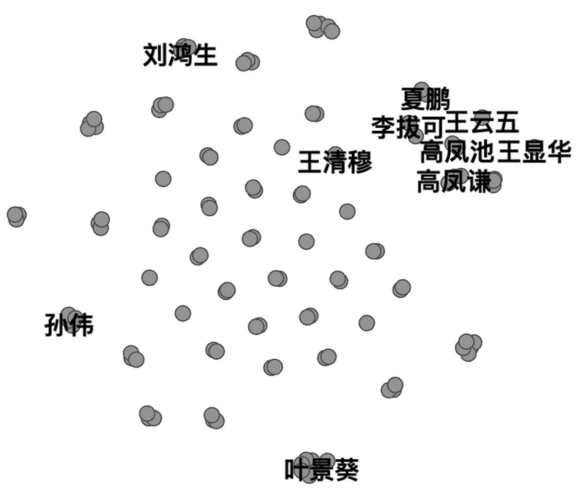


图 3 共同收信人网络图

1. 网络中权力特征

节点中心性（Centrality）用于衡量节点在图中的重要性。^{[31](100)} 计量方式分为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执行 Network - CentralityandPower-MultipleMeasures 功能，计算出共同收件人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指标，该网络上述指标排名前 10 节点如表 2 所示。

表 2 共同收件人网络节中心性排名前 10 节点

序号	节点	点度中心度	节点	中介中心度	节点	接近中心度
1	胡藻青	6	高凤池	12	陶葆霖	0. 847
2	高凤池	5	高凤谦	8	杜亚泉	0. 847
3	高凤谦	4	王显华	3	高凤谦	0. 84
4	孙宝琦	4	孙 伟	2	李拔可	0. 84
5	罗振玉	3	叶景葵	1	金伯平	0. 84
6	孙 伟	3	夏 鹏	1	王显华	0. 833
7	张 骏	3	王云五	0	高凤池	0. 826
8	郑孝胥	3	李拔可	0	张德基	0. 826
9	张文龙	3	王清穆	0	张云鹤	0. 826
10	张有孚	3	刘鸿生	0	严直方	0. 826

中介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均可以测量节点(人物)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的权力及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前者衡量的是该节点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控制他人,后者则表示该节点与网络其他节点的邻近程度,即多大程度可以不受其他节点控制。

通过对“共同收件人网络”中心性指标进行测算后发现,高凤池在该网络中掌握权力最大,其次为高凤谦(梦旦),再次为王显华,均为商务内部人士。可见,张元济与馆内人士联系最为密切,高凤池、王显华为商务印书馆高层,高凤谦、杜亚泉、陶葆霖等人为《东方杂志》核心人物。相比较“寄件人—收件人”网络,共同收件人网络进一步体现出张元济信联目的取向。工作与业务往来仍然是通信的重要内容,这一点也符合张元济工作为先的性格特质。面对近代社会政治变革及现代化与市场化的背景,我国近代出版人视书刊的编辑出版为其一生主要甚至唯一的职业。这一职业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更是他们专业志向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6](120)}

2. 区别以往的近代知识分子社群

为进一步探析网络中的潜在人物关系,本文使用 CONCOR 算法作为社群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的工具。CONCOR 算法是一种迭代相关收敛法(Convergent Correlations),主要用于对高维度的相关矩阵进行函数迭代变换以进行聚类。相较于其他传统聚类方法如 K-Means 等,具有一定的优势。^[35]

本研究经过迭代选择最大分割深度(Max depth of splits)为2,集中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为0.2为测量参数,此时 R-squared=0.416。 R^2 (R-squared)即拟合度,用来定义衡量模型拟合度的量,结果取值范围[0,1],值越大,表示模型拟合效果越好。通常来说, R^2 大于0.4认为拟合效果较优。

经 CONCOR 算法测算分为4个子群,聚类节点身份特征明显,最少社群有5人,其中包括高凤池、鲍武昌、鲍威恩、夏瑞芳、王显华这些商务印书馆“教会派”^①人员。该群体在商务印书馆早期组建过程中功不可没,但由于该群体主张“沾亲带故”的传统管理方式,企业高层聘用很大程度上基于裙带关系,而非面向社会选择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商务印书馆发展的桎梏,饱受文化界诟病。^[36]张元济的加入令商务业务版图逐渐扩展,体系的扩大也意味着传统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达到上限,“一处三所”^②的管理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同时,在张元济“推举新人”的社会网络心态与“科层制”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大量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原本的亲缘式群体被一再稀释。而最大社群由76人组成,其中既包括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知识分子,还包括李拔可、高凤谦、陆费逵、郑孝胥等馆内同仁。该网络聚类知识分子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开放性、复杂性、社群性。士的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37]

此外,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出版人通过书籍、报刊进行沟通交流实现其在现实空间中交往活动的延伸,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张元济的社交网络展现了庞大的政商人脉集合,在教育资源的应用尤为突出,尤其在教科书出版等社会性事件中体现了新的社群合力^[38],业缘联结形成新的权力关系模式,出版业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寻找情感交流与身份认同,乃至建构其社会资本等的新途径。

(三) 联合寄件人网络分析

通过数据筛选与清洗,联合寄件人网形成23*23的1-模邻接矩阵,其中包含119条边。通过利用 YiFan Hu 算法生成网络可视化图形,如图4所示。图中标出姓名为网络中介中心度排名突出节点。

① 教会派:商务印书馆最初创办人夏瑞芳、鲍威恩、鲍武昌、高凤池,为由教会主办的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且均为教徒,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且以血缘关系引进人事,因此称他们及亲属为“教会派”。与其相对的是以张元济为代表的馆内知识分子群体,称“书生派”。

② 一处三所:张元济主政商务后为精细业务成立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一处为总务处,较三所后成立,作为决策中心,重要事项与三所所长一同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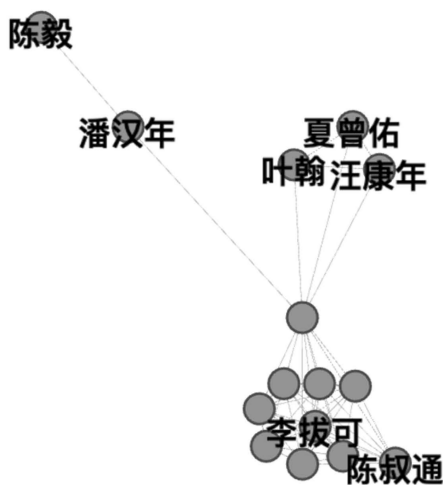


图 4 联合寄信人网络图

1. 权力节点背后的社会资本

执行 Network-CentralityandPower-MultipleMeasures 功能，计算出联合寄件人节点中心性相关指标，该网络上述指标排名前 10 节点如表 3 所示。

表 3 联合寄件人网络节中心度排名前 10 节点

序号	节点	点度中心度	节点	中介中心度	节点	接近中心度
1	张乾若	9	潘汉年	2.814	张乾若	8.98
2	叶景葵	9	刘鸿生	2.577	叶景葵	8.98
3	胡藻青	9	史量才	2.324	胡藻青	8.98
4	项兰生	9	陈毅	1.876	项兰生	8.98
5	陈汉弟	9	窦耀庭	1.424	陈汉弟	8.98
6	钱自严	9	汪康年	1.372	钱自严	8.98
7	陈叔通	9	夏曾佑	1.36	陈叔通	8.98
8	李拔可	9	李拔可	1.121	李拔可	8.98
9	唐文治	9	陈叔通	1.121	唐文治	8.98
10	叶瀚	3	叶瀚	1.098	叶瀚	8.765

与共同收件人不同，联合寄信人网络中，中心性排名较前节点（人物）多为社会政商界人士，如藏书家张乾若、银行董事叶景葵与胡藻青、“火柴大王”刘鸿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等（由于节点身份复杂性，研究基于“知网—知识元检索—百科”及百度百科网站交叉检索，确定节点人物首要单一成就身份以展开进一步分析），其中节点人物所涉界别十分广泛。同时，回溯联合寄件关系下的书信数据发现，内容涉及多为社会公共事务，如汪康年等人参与浙路废约，以及著名的上海滩“十老上书”事件。据此推测，政商界人士在联合寄信人网络中“表现突出”与联合寄信行为背后动机有关。联合寄信行为背后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寄件群体社会资本的调用，整体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行动者异质性越强，社会资本越为丰富。^[39] 因此，社会资本的叠加对于公共事件的征询乃至上访大有裨益，联合寄件更有利于寄件者目的的达成。

2. 公共事物推动网络人物节点聚集

采用 CONCOR 算法, 本研究经过迭代选择, 最大分割深度为 2, 集中标准 0.2 为测量参数, 此时 $R^2=0.779>0.4$, 拟合效果好。经 CONCOR 测算分为 4 个子群 (如图 5 所示)。

通过聚类与信件内容回溯发现, 联合寄件人网络节点多因社会公共问题产生勾连, 而为何产生勾连也值得进一步探析。通过社群可视化发现, 几乎每个聚类都存在至少一个以上的知识分子节点。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较于前士大夫出现了一种“社会分化”, 即“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官僚角色之间的分化与分离”^[40]。由于政治权力的削弱, 相较于传统士大夫, 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地位出现下降。以往由士大夫代表的“劳心者”以及“农工商”代表的“劳力者”两大阶层, 到晚清进一步分化出“中等社会”这一第三阶层。^[41] 学者杨笃生认为, 中等社会的职责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 “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42] 从思维观念来看, “中等社会”对于公共社会关心的使命感实则是一种“儒家精英主义传统在近代的延续”。知识阶层认为国民除了是一种法律资格, 也是一种参政能力, 而这种能力是需要教化的。因此, 诸多知识分子秉持儒学教义, 扎根于出版行业。在近代转型的社会背景下, 通过书籍这一公开媒介“开民智”, 引导舆论空间, 逐渐成为反抗专制统治的异己力量, 进而实现经国济世的抱负。但不可否认的是, 近代知识分子的“政”“知”分离导致其社会地位在近代下降, 因此在面对公共问题时, 知识分子联合社会各界人士, 以调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象征性资本形成“复合权力”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 推动转型社会发展。

此外, 研究发现, 在联合寄件人网络中, 潘汉年一人独立成为一子群。同时, 通过 Ucinet 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功能进行测算 (执行路径 Network-CorePeriphery-Continuous), 发现潘汉年处于网络边缘位置, 结果如表 4 所示。通过回溯数据中与潘汉年有关的信件内容及查阅相关史实发现, 潘汉年曾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共情报员。^[43] 由于身份限制与工作特性保密要求, 其单线联系较多, 而与他人联合寄件情况较少, 这一点也符合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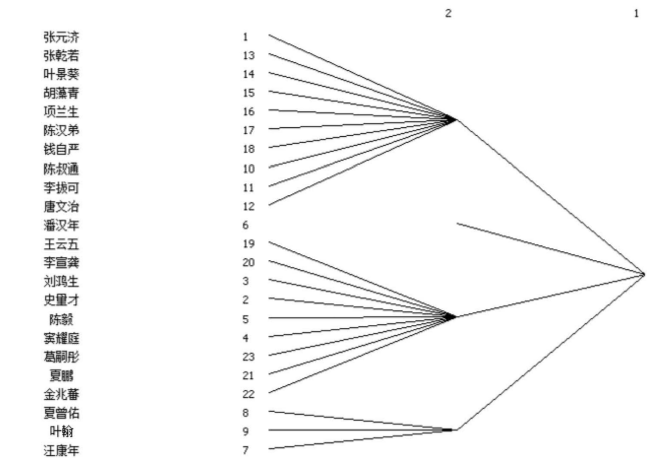


图5 “联合寄件人”社群发现可视化

表4 联合寄件人核心-边缘测算结果
MultiplicativeCoreness

Corene		

1	张元济	0.333
2	陈叔通	0.313
3	李拔可	0.313
...
14	潘汉年	0.034

3. 网络间的相关性

“联合寄信人网络”与“共同收信人网络”中人物是否存在联系? 为了验证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研究利用 Ucinet 软件对上述矩阵进行 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分析。QAP 是一种二次指派过程。通过对方阵的各个格值进行比较, 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 以检测两种关系矩阵之间是否相关。^[44] 将“共同收件人”与“联合寄件人”网络节点对

应，构建 129 * 129 的 1-模邻接矩阵，通过 Ucinet 对称化（Transform-Symmetrize）处理，所得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共同收件人网络与联合寄件人网络节 QAP 分析结果

QAP Statistics

相关性系数（QAP Correlation）	显著性水平（QAP P-Values）
0. 142	0. 000

其中，QAP Correlation 是指网络之间的实际的相关性，即观察到的相关性系数^{[31](280)}。QAP P-Values 是指显著性水平，当 $P<0.05$ 时，说明两个网络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45] 由表 5 计算结果可知，“联合寄件人网络”与“共同收件人网络”的相关系数为 0. 142，显著性水平为 $0.000<0.05$ 。说明二者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程度较小，仅为 0. 142。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为：第一，数据来源限制。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为张元济个人书信，样本量较小，同时网络其他节点个人信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数据缺失，故而不能完全反映出整体书信网络的实际情况。第二，共同收件人网络与联合寄件人网络本质机理存在差异。一方面，共同收件人网络反应的是信宿节点的被动连接关系，而联合寄件人呈现的是信源节点的主动连接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信件节点身份归属查询及信件内容查阅发现，前者形成的由头多源于业务沟通、同乡问候叮嘱，平等交流属性更为明显，各子群包含节点较多，群体圈层中具有同质性。而后者形成的由头多来自对公共事件的请愿与申诉，跨阶层沟通的属性更为突出。网络形成多因寄件人资源整合，与联合寄件行为的内在逻辑基本一致。节点间的职业特征、社会圈层均出现了较大差异，张元济作为联合寄件人的一员，强调其多元一体的社会身份对各群体的聚合作用，以社会交往中的资源互助弥补了“士”转型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后在政治权力方面的缺失。虽然上述两种网络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信件的往返及信息、情感和资本的流动，但二者相关性较小。此外，共同收件人网络与联合寄件人网络中节点的连接关系，可能会通过张元济社交圈层的冗余产生交流、碰撞，从而导致两种网络在统计学上存在相关性。

四、结 论

张元济出身名门望族，清末中进士，后主政商务印书馆长达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巨擘。其身份的复杂性侧面佐证其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亲历性，他是近代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再到商绅转型的典型人物。本研究以张元济个人书信切入，试图通过张元济社交网络管窥近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之全貌。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出版人参与 20 世纪前出版社等公共空间的建构；另一方面，出版社不仅作为联系出版人的行业组织而存在，还与政界商界学界工界保持联系。蕴含着出版界与政治国家，出版界与市民社会，出版界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复杂关系与变量。综上，本研究对于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探讨分析有着重要意义，而通过实证分析提炼张元济出版思想，能为当代出版人带来一些启示。

任人唯贤，敢为人先。对于商务的管理张元济敢为人先，主张推举“新人”“贤人”，致力以先进企业管理方式破除以往血缘、地缘中“负向社会资本”^[46]对企业发展的桎梏，同时更是身体力行“事业不传代”，这种“弱关系”网络心态也正是中国出版业现代化转型在其个人身上的投影。在张元济的努力下，当时商务企业制度内容的完善程度与创新性均可堪称业界的执牛耳者。而其身上开拓创新、勇于变革的思维也值得当代出版人学习。

树高千尺，唯有根深。张元济并没有完全脱离血缘亲缘的影响，其与海盐同乡、家庭成员的通信文稿也体现了他对于“强关系”网络的维系。他曾在信件中介绍远族孤儿到高凤池创办的“龙华孤儿院”

读书, 可见张元济对家族谱系、祠堂、祠产等宗族之事也是极为重视的。知识分子无法与人文传统全然切割, 尤其当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诸多出版人与乡土的关系疏离, 身份认同下的精神故土重建在愈加现代化的知识生产中更是一种温情补充。出版人在传播过程中并非只是纸张书本等载体的加工者, 时代与地域所锻造的格局视角与文化经脉使其内含无形的价值, 也正因如此知识生产内容才会言之有物, 也更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心系天下, 广开民智。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的职业胸怀也应是当代出版企业机构、编辑的志向所在。可以说, 张元济不仅着眼于出版社的发展, 而且致力于创办提高全民素质的“大学校”^[47]。在特定历史时期下, 知识分子身份在开展社会活动存在局限性, 但他们在公共事件中努力寻求社会支持、对资源进行合理整合, 以推动社会发展。儒生捍卫“经世致用”的理想, 后辈也当继往开来, 发扬“平治天下, 舍我其谁”的情怀。出版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 应站在时代潮头, 在出版实践中时刻树立文化担当的意识, 向导国民、监督政府,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与舆论环境。^[48]

本研究结果仍然存在遗憾之处: 第一, 由于当前张元济相关书信数据有限,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研究仅选取 3880 封信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且数据采集端口均来自于张元济个人书信, 未能穷尽收集张元济个人书信数据, 因此研究结果无法完全代表张元济公共交往情况。第二, 对于书信数据挖掘还有可提升空间。本研究未对书信时间做排布梳理, 导致对张元济公共交往研究呈现出一种静态结论。未来对书信网络的历时性研究, 或许值得另行展开。

参考文献:

- [1] 叶隽. 清民之际知识精英的著译事业、教育理想及其东方现代性诉求——以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及其与张元济等出版人的互动为中心 [J]. 长白学刊, 2016 (1): 133-140.
- [2] 王建辉.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2): 77-82.
- [3] 罗映纯. 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企业——简论张元济时代“文化商务”品牌及历史意义 [J]. 中国出版, 2010 (22): 73-76.
- [4] 张人凤. 张元济年谱长编 (上)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1444-1542.
- [5] 廖申白. 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4): 74-79.
- [6] 杨军, 陶安涛. 我国近代出版人的公共交往探论 [J]. 出版科学, 2022 (4): 113-120.
- [7] 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4.
- [8] 许纪霖.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3): 123-130+134.
- [9] 梁君思. 角色转型·权势迁移·遭逢巨变: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聚集的动力机制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 (5): 131-139.
- [10] 罗映纯, 林如鹏. 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5): 102-108+112.
- [11] 陶阳. 作为文化行动的公共交往——对清末学堂学生的生活史考察 (1900—1911) [J].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2020 (1): 1-56.
- [12] 杨军, 郑雷. 近代上海书业同业组织制度变迁析论——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J]. 出版科学, 2019 (6): 116-119.
- [13] 萧邦齐. 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M]. 周武彪,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246.
- [14] 吴芹芳. 张元济图书事业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 [15] 金炳亮. 论商务精神的传承: 以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往为中心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4): 140-148.
- [16] 闫卫平. 1937-1949 年张元济与王云五的交往——基于《张元济年谱长编》的考察 [J]. 浙江档案, 2015 (8): 52-54.
- [17] 周武. 张元济与近代文化 [J]. 史林, 1996 (3): 69-95.
- [18] 袁晓川, 刘明洋. 官商身份转换背景下的张元济报刊媒介认知与实践 [J]. 编辑之友, 2018 (9): 94-98.
- [19] 范军, 欧阳敏. 出版生活史: 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J]. 现代出版, 2017 (2): 60-73.

- [20] 张琬. 水流云在: 张元济孙女的自述 [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 48-137.
- [21] 王建辉.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薪水和作者稿酬问题 [J]. 出版发行研究, 2002 (8): 65-72.
- [22] Wellman, B. & Berkowitz, S. D. (1988).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83 (4): 19-61.
- [2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29.
- [24] 庞慧敏, 张倩. 清末民初女性报人社会网络的现代化进程与反思 [J]. 国际新闻界, 2019 (4): 126-142.
- [25] 周浒. 社会关系网络视阈下的新闻人范长江研究 [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6] 赵丽梅.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数字出版联盟运营机制研究 [J]. 出版科学, 2014 (6): 74-77.
- [27] 罗映纯. 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企业——简论张元济时代“文化商务”品牌及历史意义 [J]. 中国出版, 2010 (22): 73-76.
- [28] 李惠, 侯君明, 陈涛, 朱庆华, 刘炜. 星汉窃渺——书信网络中蕴藏的人际关系挖掘 [J]. 图书馆杂志, 2020 (5): 86-92+80.
- [29] 王众托, 王志平. 超网络初探 [J]. 管理学报, 2008 (1): 1-8.
- [30] 李惠, 侯君明. 古代书信体文献的社交网络模型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8 (3): 164-172.
- [31] 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2.
- [32] 滕沐颖, 赵云泽.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虚拟社区“认知盈余”实现过程研究 [J]. 新闻大学, 2017 (3): 79-87+150.
- [33] Scardoni, G. & Laudanna, C. (2012). *Centralities based analysis of complex network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4] 张树年. 我的父亲张元济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7: 148.
- [35] 沈娟华. 基于相关矩阵和混合指数分布的聚类分析 [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7.
- [36] 欧阳敏. 以科层制破除人情网: 企业家张元济的关系网络心态考察 [J]. 编辑之友, 2021 (4): 100-105+112.
- [37] 罗志田. 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93.
- [38] 黄剑. 商事如政事——张元济“以政入商”下的文化运作 [J]. 安徽史学, 2016 (4): 89-96.
- [39] 彭靖里, 谭海霞, 王崇理. 竞争情报中人际网络构建的理论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的分析观点 [J]. 图书情报工作, 2006 (4): 38-42.
- [40]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7.
- [41] 许纪霖. “少数人的责任”: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J]. 近代史研究, 2010 (3): 73-90+3.
- [42] 张枬, 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60: 615.
- [43] 潘宇俊.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情报工作研究 [D]. 西安: 西安工业大学, 2018.
- [44] 苏娜, 张志强, 刘志辉. 基于链接分析的图林博客显著度分析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0 (1): 98-102.
- [45] 李纲, 王忠义. 人际情报网络与知识本体网络之间关系研究 [J]. 情报杂志, 2011 (6): 36-39.
- [46] 龚虹波. 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一个中西方社会网络比较分析的视角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 (12): 99-105+98+158.
- [47] 范军. 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89.
- [48] 王芙蓉.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 107-110+115.

[责任编辑: 高辛凡]